

# 玛拉沁夫:真正践行讲话精神 才对得起作家的时代使命

□本报记者 明江

走进玛拉沁夫的家,一眼就见到大大的书桌上摆着很多张画过线的报纸,小便条和笔记本上记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参加完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的这些天,玛拉沁夫关起门来认真研究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细心领会,记下了自己很多心得和想法。交谈中,玛拉沁夫戴着老花镜认真看笔记的样子,让人对老一辈作家的认真与严谨不由得心生敬意,而他近年来对文艺工作的思索与期待更是让人深有感触。

## “不能在文艺雾霾中进行文化长征”

谈起参加文艺座谈会的感受,玛拉沁夫仍然非常感慨:“这么重要的会议,只开了半天时间,开会中间完全没有以往会议的过场和客套,如此简洁亲切,首先就表现了新一代领导人的平民化作风。这次会议引起的反响更是超乎了我的想象,知道我参加了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很多朋友甚至专门从国外打电话向我询问情况。开会之后有很多媒体约我采访,我都婉拒了,因为我觉得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地思考,不要兴奋以后一阵风似的又过去了,不能辜负习总书记对文艺界的一片深情和期望。”

得知要参加会议,玛拉沁夫就给自己拟定了四步学习计划:一是用心地听,二是细心地领会,三是诚心地自省,四是真心地践行。

在会上,因为听力不好,玛拉沁夫的手一直拢在耳朵背后聚音,惟恐落下一个字。会议结束后,他赶紧找来各大报纸认真研读,细心领会,他说,学习文件的过程更多地处在自省阶段。

“很多天了,我一直在细心思索习总书记的讲话。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肯定了文艺界的成就,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指明了改进和前行的方向,对我们文艺界很宽容、爱护和尊重,我们文艺界应当正视存在的问题、缺点、弱点与不足,应以诚心自省、真心改进来回报党中央、习总书记。我们应当反思这些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文艺界出现了什么问题,看到我们的长处的同时也看到弱点和缺点。”他认为,文艺工作者要自省,首先应该清楚文艺工作者的自身

定位:“习总书记说:文艺工作者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非常重要,可以看出来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待如此之高。正如习总书记说过的,‘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可见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是如此光荣而崇高,但我们很多人没有这种认识和使命感,所以就会出现低俗化、庸俗化,甚至很多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和身份,人们对文艺工作者的期望背道而驰。在我看来,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变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价值观的底线、道德理念的底线、职业操守的底线和法律法规的底线,都是必须守住的,这是最低的要求。现在的误区是认为守住底线就了不起了,但其实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不只是守住底线,而是要达到高线和上线。文艺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不能够在文化垃圾上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更不能在文艺雾霾中进行文化长征。”

“文艺雾霾”是玛拉沁夫引用一张报纸标题的词,他认为这个词深刻表达了文艺界需要反省的状态。

## “不只深入生活,更要扎根生活”

让玛拉沁夫欣慰的是,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正是一次对文艺界的方向引领。所以在他看来,深刻反省之后提出确实的改进措施,义无反顾地执行和落实会议精神更为重要。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很多天了,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能够冷静思考的阶段了。需要坐下来,回顾和思索我们的长处和不足之处,然后认真地加以改进。”谈到如何践行会议精神,玛拉沁夫认为,目前社会上浮躁、浮华、浮夸和奢侈、奢靡、奢华现象比较严重。作家是灵魂工程师,自己首先要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摆正位置、认清差距,义无反顾地践行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开创一片新天地,梦想就在前方。

“首先解决跟人民的关系,跟生活的关系,跟时代的关系,我觉得现在提深入生活提得太少,有些时候甚至用‘采风’代替了深入生活。所谓采风我并不

反对,作家的视野除了深度还需要广度,作家到各地乃至各国参观访问,可以开阔视野,是有益的,但是不能用‘采风’代替深入生活。从习总书记这次讲话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简单地提深入生活,而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个要求很高啊,要求作家把根真正地扎下去,万不可用‘采风’取代!”

对习总书记谈到的三个“精”,玛拉沁夫更是深有感触:“现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不仅价值观、道德观不淡了,连修炼、提高文艺技巧也不提了。作品离开技巧可以吗?构思的精巧,描绘的精深,制作的精湛,都是离不开文艺修养的。文艺技巧是需要长期地、大量地、系统地艰苦学习的,不是随便上几天作家班就可以得到的,现在很多小说没有文学性,诗歌就是大白话,缺少激情、筋骨与温馨,但作者往往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年轻时,刚写一两篇作品几乎没有别人敢说自己是作家,我们都说自己是初学写作者,还需要从艺术上到精神上反复磨练自己。再比如‘文革’前17年,一共出版了360多部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套红色经典丛书,包括《红岩》《红日》《红旗谱》《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等,就有30多部,经典率10%。现在据说一年出版5万部长篇小说,连5部经典都没有,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不讲作家深入生活、不谈文艺价值观、不进行文艺创作的综合技能修炼,怎么做到‘三精’,怎么出现高峰?”

15岁参加革命、16岁开始搞文艺创作的玛拉沁夫今年已经85岁了。这位21岁就在全国出名的蒙古族作家,年轻时多次长期深入生活,去和草原牧民们同吃同住,去工矿当工人,“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对人民和时代怀着感恩之情,对生活和文学就有敬畏之心!”

玛拉沁夫认为,今天文艺界都在学习习近平同志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文艺界多年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群情高涨的大好形势,“诚然,我们深知学习讲话,关键在于践行!要按讲话精神去实实在在地做!让我们文艺工作者真正成为合格的铸造灵魂的工程师,为实现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只有我们义无反顾地践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才对得起作家的时代使命,才能不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文艺工作者的深切期望。”

# 文艺不能绑在市场的战车上

□朱辉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所谓社会意识形态,就包括哲学、宗教和艺术等。恩格斯更是形象地将它们比喻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领域。

所以文艺不仅在市场之上,而且是在整个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归根结底才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但同时它们也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因素产生反作用。市场,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环节;市场经济,也仅仅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它们与艺术的关系是交互作用的。

我们现在进入到市场经济阶段,这是社会发展不可绕开的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并不决定社会生活的一切,尤其不能裹挟像文艺、法治、道德、宗教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的时代课题,十分深刻而全面地阐述了关于文艺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对文艺与市场关系的辩证判断,值得我们深切领悟和反思。

可是长期以来,为什么文艺界内外都有不少人误认为:文艺要绑在市场的战车上呢?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要弄清:文艺作品究竟是不是商品,是什么样的商品?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看,文艺作品可以是商品,也可以不是商品。我曾在《文学的位移:作品—产品—商品?》(1995)一文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学及艺术,首先是作品;在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后,可以是产品;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也可以是商品。

作为产品和商品,文艺因此生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精神价值之外,还可以成为一种物质财富。一尊兵马俑,便可价值连城;几块汉像砖,更是富可敌国。从国际间来说,软实力的竞争,不仅是国民精神影响力、渗透力、号召力的竞争,也涉及到文化产品作为物质财富的竞争。好莱坞电影就是典型的代表。正是由于文艺作品具有无法估量的经济价值,所以招惹了众多所谓“经济人”蜂拥而至,云集于此。这,究竟是文艺之幸,还是不幸呢?

尤其是成为商品之后,文艺自然就要进入市场;但我们一定要指出,因文艺主要不是商品,因此也可以一半由市场运行,还可以完全不进入市场。这就是文艺与市场关联的二重方式。当然文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多重的,比如市场对于文艺的制约,文艺对市场的影响,以及文艺与市场的互动,等等,不是这篇短文能说清的,异日再专门探讨。此处可简括地讲几句:市场确实可以推动文艺的传播,而文艺也能对市场加以引导,二者的相互作用都有助于提升或拓展对方……

而就是进入市场作为商品的文艺,也还是特殊商品,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即便是那些专为市场而生产制作出来的言情、武侠、警匪、谍战小说影视等,也要有比较鲜活的人物形象、令人可信的故事情节、具有生活气息的社会场景以及一定的文采,最主要的,还要有符合大众心理的伦理取向。尽管可以不要求它们有多少独创,能流传多久,但一定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内涵是必不可少的,因而绝不同于手机、汽车等的生产。连药品生产都有特殊的严格要求,对文艺这样的“精神良药”不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吗?

要弄清文艺与市场的关联,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文艺作品的价值构成。依据经济学原理,商品的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的凝结,价格围绕其价值波动。那么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创作它的文艺家所投入的丰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而是经由文艺家凝结了丰厚的社会实践、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公众审美理想。因此文艺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就是其经济价值,也不同于普通商品。所以文艺固然可以估价,但那价格仅仅是对其价值某一方面的反映,并不能完全体现文艺作品的价格。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等,是怎么也无法单纯用金钱来估价的。进入市场流通后随着交易双方的博弈,文艺作品的价格也会有所波动,但是这些标价,依然不能体现出作品的所有价值。谁能说,以4.368亿元刷新中国艺术品成交纪录的黄庭坚《砥柱轻》,就完全体现了该作的价值?或者,代表了中国书画的最高价值?

由上可知,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

是一推入市场文艺就能繁荣,就会发展。恰恰相反,如果过早地、不恰当地将莫扎特、梵高等的作品推入市场,那很可能更加快他们的夭折。

与之相关,是文艺服务于文艺家,在市场经济时代都不可能不受到市场的制约甚至摆布。就像文艺作品的价值一样,对文艺服务于文艺家的价值,也不能简单地以市场价格来衡量。有些服务固然是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有些服务恰好应当游离于市场之外,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文艺家的情况更为复杂,同一个文艺家可以接受商家订货或者为市场而创作,那当然就随行就市了;但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早就分析过不一样的情形,“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磅。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去让她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里的‘生产劳动’是亚当斯密的术语,用来指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则不是。因此,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文艺家依然能够像弥尔顿一样‘出自他的天性’进行能动地写作,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家连这条都做不到吗?”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是对当代中国文艺家的谆谆告诫。我们务必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教诲:“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以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我体会,习总书记固然对文艺家讲的,文艺家要身体力行,但整个社会也都应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市场大腕们,不要再以金钱的杠杆、利益的驱动,来诱惑或胁迫文艺家就范了。那样必定会损害文艺,进而波及人们的灵魂和社会的风气。还是让文艺家顺应时代的潮流,呼应人民的心声,按照各自的的天性,自由地思考,自在地想象,自主地创作吧。

##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推动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 广东文艺工作者深入东莞清溪镇创作采风

新华社广州11月10日电(记者 马晓澄) 广东省文联10日组织约60名省内文艺工作者来到“全国文明村镇”东莞清溪镇,举办“送欢乐下基层”惠民活动暨文艺精品创作采风活动。

当天,广东省文联组织的文艺工作者们在清溪镇银屏山天池,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清厦屋村客家围等地进行摄影、诗歌、美术、书法、戏剧和魔术创作。晚上,在镇文化广场,大家为群众奉献一场汇聚音乐、舞蹈、戏剧、魔术和杂技等门类的演出活动。活动中,国家一级演员唐彪演唱了当天由杨湘粤作词、崔隰和作曲的歌曲《清溪有梦千万里》。

为便于文艺工作者们深入生活,开展精品创作,当日广东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协会与清溪镇荔横村签订了基层采风活动合作意向书。今后若干支文艺小分队将到荔横村开展精品创作采风活动和惠民服务,采风期间的食宿费用自行解决,荔横村则负责为采风创作提供创作素

材以及相关便利。荔横村还聘请一名文艺工作者联络员为该村名誉村长。

广东省文联和省文艺志愿者协会还在清溪镇文化中心设立了“广东省文联文艺志愿者创作基地”。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程扬说,省文联正拟定今年采风创作精品规划,将组织上千万文艺工作者深入全省60多个乡村、工厂、和社区等开展创作采风活动,每个村也将会聘请联络员担任名誉村长。

“通过建立文艺创作结对基地,大家可以在基层采风中收获灵感,在生活的泥土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创作出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基层的文艺新品、精品,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程扬说。

近年来广东省文联坚持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摄影大篷车”、“戏剧进校园”、“曲艺大家唱”、“书法进万家”、“舞者展风采”、“百姓健康舞”和“音乐廊”等文艺惠民活动,足迹踏遍全省各地,惠及群众上百万人次。

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原创力。而原创力来自于生活,深扎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春蚕不食桑无丝,蜜蜂不采花无蜜。“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民群众和他们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和“源泉”。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作品,每年都有大量的新作问世,传统媒介新兴载体,海量的作品充斥市场,从数量和规模上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我们缺佳作缺力作,缺精品缺大作品。关键就是创新创优不够,文学原创力严重匮乏。一个没有节制的复制的时代,似曾相识的,人云亦云的,一般化的,表面化的东西很多。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尤其直接书写当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反映他们的诉求和心声的,并使他们非常爱看的、即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俱佳的作品从数量到质量都不能尽如人意。面对这些问题,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我结合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谈一点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粗浅体会。前一阵有个朋友问我,你在苏州几十年,生活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写在这里,家人在这里,朋友在这里,社会关系在这里,几乎一切的一切都在这里,你写的小说,也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可你现在跑到南京去了,你去“上班”了,你去体会另一个地方和另一种生命了,你的人生的风格会不会变,你的作品的风格会不会变?会不会有一天写出南京味来了?

一个“变”字,引发了我的思考,也让我觉得有话可说了。我回答他说,南京味应该是不会有的,但风格的变化又是必然的。过去的30年,我一直在苏州写作,给人印象就是苏州作家的特色,小桥、流水、人家,以这种风格为主的小说,好像早已经定位了。这一类的小说故事不是大起大落惊心动魄,只讲究一种气场,讲究一种情状,讲究一种韵味。这可能比较适合苏州城市风格。苏州城市的风格是由它的文化底蕴决定的,苏州人肯干事但不张扬不外露,风格上比较儒雅。我从小在苏州长大,受苏州文化影响较大,我创作的文学形象、营造的文学氛围肯定是苏州化的,这种风格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淡而有味,小中见大的境界,而不仅仅是精致精细。但是这种追求带来了问题,许多人能够感觉到你的淡,却感觉不出其中的味,于是就淡而无味了。就像有些北方人喝碧螺春的感觉。这是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决定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小说看似平平淡淡,但内含的是人性的东西,是内在的精神冲突,自己津津有味,但别人不一定认同。

主观上自己反省,什么样的作品能让人提起精神、感觉振奋?从客观上讲,我们身处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年前,苏州的小街小巷还在,街巷里的老头老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乡村妇女还在,就鲜活地在你眼前,但是后来慢慢地消失了,没有了。好像主客观条件都不让你再像原来那样写了,这时候变化就是身不由己了。

我的目光投射的群体已发生了变化。在后来的一个写作阶段中,我写了大量农民工的生活,其实不能说是我主动将目光投向他们的,而是这个群体扑上门来了,它急切而全面地扑上来了,它轰轰烈烈地扑上来了,你想躲也躲不过,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法跟它们分开了,它们把你装修房子,它们给你送纯净水,它们将你无法处理的旧垃圾拖走,它们日日夜夜站在你家小区门口,守护着你的平安日子,你到饭店吃饭,给你端盘子送菜的,几乎清一色是外来打工者,你走在街头,会看到一溜排开的工棚,如果你伸头进去看看,你就知道他们的生活处境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们的大量出现和存在,甚至使得我们每一个城市的方言都渐渐地淡去了,就是这样一个个庞大的群体,他们顽强地走进了我们的目光。只要不是有意闭上眼睛,你的目光就无法离开他们了。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记者忽然问我,你写了许多民工生活的小说,但是你了解和关心过“80后”、“90后”的农民工吗?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所了解的和我作品中的农民工,大多数是“80后”、“90后”的父辈辈农民工,他们在城市艰辛生活,省吃俭用,积攒下每一分钱,然后带回家去造房子,给儿子讨媳妇,再抚养子孙孙女。所以,他们除了一天三顿饭饱肚子,几乎没有其他消费,天一黑就在工棚里睡着了,听不见风声雨声,甚至连梦也不做,因为他们太累了。从这一点上讲,他们虽然人在城市,但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孙辈也进城来了,“80后”、“90后”的农民工,他们比父兄有文化,一般都是初中毕业,甚至读过高中,他们不可能像他们的父兄一样,早起打工,天黑上床,除了生存渴求外,他们的精神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呢?我开始关注“80后”、“90后”农民工的状况,这是一群从物质到精神都想要融入城市的新农民工,他们恐怕也不会像父兄那样在城里干几年后再回老家了。我开始有意地关注他们,有一次和一位公司老总聊天时,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的数十位安保人员,无一不是外来的民工,他们住在公司提供的一住房内,每个月的上半月,晚上在住处是见不到他们人影的,一发工资,他们就出去消费了,下馆子,进网吧,看电影,去KTV,城里年轻人去的地方,他们都想去。于是,到了下半个月,钱花完了,无处可去,蜗居在住处,甚至连手机上网费都耗尽了,无聊地熬着漫长的夜晚。他们没有积蓄,对收入基本没有计划,这样的日子,他们打算过几年呢?除了网吧和馆子,他们的精神追求又在哪儿着落呢?我们应该如何给予他们关注和帮助呢?对这样一个新的群体,我想,我的目光,会更多地投向他们。

然后,我又渐渐地从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身上,扩展到在城市打拼的更多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多半来自农村乡镇或偏远的小城市,即所谓“外地人”,又多半有或高或低的学历,或者掌握了一门技术,他们也许会比农民工稍稍优越一点,但是在城市,他们同样是最底层的,最艰辛的,尤其是上过大学、有学历的年轻人,不仅他们自己有梦想,想从物质到精神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连同他们的家人亲朋,都指望在他们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的压力,比起相对单纯的农民工来,也许是更重大的,在城市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如何面对,如何生活,如何实现梦想,等等这些,都激发了我写作的激情,我渴望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写出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于是,家电维修工、网络维修工、公司蓝领、房屋中介公司的中介人员,年轻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快递员、邮递员,等等等等,纷至沓来,来到我的笔下,来到我的作品中,这个群体,网络上统称“屌丝”、他们自己也自称“屌丝”,我打心坎深处关心和关注着这些屌丝,我曾经写过其中一个短篇,篇名就叫《屌丝的花季》,我希望他们都能拥有自己的花季,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这样,我的写作一直在变化,有一位批评家曾经说过,想不到“一直被认为温文尔雅、姿态柔软的范小青内里竟蕴藏着如此强烈的求变欲望”。确实,就我几十年的创作而言,变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正如这位批评家所说:“不同材料,不同对象和不同的内容都会导致手法、视角的变化。重要的是创作的变化往往是生活所逼。”

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大地,就是人民,就是我们鲜活真实的社会生活,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我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作家艺术家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身处沸腾的生活之中,而不是站在一边观看,不是蜻蜓点水似的认识。沉下心,沉下身,摒弃浮躁,零距离观察生活,真实体验生活,深切地思考生活,应该成为作家艺术家的职业习惯和必修课。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作家和动人的形象。作家艺术家要接地气,作品才能有“生气”、“有灵气”、“有人气”,也才显得“大气”。正如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所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也是时代对于文学工作者的要求。就目前整体的文学创作来看,比起新鲜丰富复杂错综的社会生活,我们的作品还远不到位,远不生动,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索去实践的问题。作家们要在感情上跟各阶层的人们沟通,体会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所以,作家无论在何处,家在何处,工作岗位在何处,心一定要在下面。下面是群众,是百姓,是大地,是我们坚不可摧的基础。作家脚踏大地,心系群众,思想境界才能上去,才能从更高的视点去观照,对历史对社会有自己独特的深度的思考和研究。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具有震撼人心的永恒力量,就是因为它们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深厚的人文情怀,作品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脉搏共同跃动,展示人类共同的理想情怀。

# “我们的沃土我们的梦” ——安徽千余名文艺工作者下基层采风

作者下基层采风”活动的序幕。

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唐雪介绍,此次活动省文联各协会、各市区文联采取多种形式,组织1000余名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采风,一方面是送文化下基层,通过图书、音像制品、文艺演出等不同形式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为群众提供精神食粮;另一方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扎根田间地头,与群众同吃同住,体验基层生活,了解群众所需所想,从而创作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

作为首批下基层的文艺工作者之一,

作家赵宏兴告诉记者,这几天在太和县张路村的走访中深深感受到,现在农民物质生活富裕了,但文化生活还相对贫乏,老百姓渴望有新的理念、新的思想传进来。

“深入基层一直是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只有深入基层生活,真正了解群众爱看什么、想看什么,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反映农民的生活,我感觉这项任务迫切而艰巨。”赵宏兴说。

此次集中活动将持续1个多月,由1000余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20支文艺小分队已于11月初起分赴皖南、皖北、大别山区等多地市进行下基层活动。集中活动结束后将转为常态化、常态化的下基层采风。